

立案前之江大学的课程设置及其特点

任杭璐, 刘剑虹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之江大学作为 19 世纪末由西方差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 13 所基督教会大学的代表之一, 是唯一由美国南、北长老会在浙江联合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独具特色的课程设置奠定了浙江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为近代浙江新式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键词: 立案前; 之江大学; 课程设置; 特点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1) 06-0027-05

1877 年和 1890 年召开的两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 完成了新教在华传教策略的全面调整。在教会初等教育的基础上, 出现了教会中、高等教育机构。^[1] 之江大学作为 19 世纪末唯一由美国南、北长老会^① 在浙江联合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于 1931 年 7 月在中国注册立案。在办学近百年时间里, 其开拓性的办学理念和课程设置, 影响了近代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果想知道为什么 20 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干脆地抛弃了中国传统, 那么就必须研究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历史”^{[2]18}, 鉴于此, 本文回归到教会大学本位, 探寻 1845-1929 年之江大学立案前课程设置的演进情况, 挖掘其前期课程设置的特点及其理念。

一、立案前之江大学的课程设置概述

立案前之江大学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 即兴建时期 (1845-1910) 和扩建时期 (1911-1929)。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必然带来学校教育的变化, 而这些教育变化又推动了课程设置的不断变革。

(一) 兴建期的课程设置 (1845—1910)

1843 年 7 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并议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开埠通商。宁波成为西方传教士来华的重要据点之一。1843 年 10 月, 美长老会派传教士麦嘉蒂 (D.B. McCartee) 来华, 次年 6 月抵宁波。1845 年 4 月, 在其协助下布道站礼

查威牧师 (Richard Way) 于宁波江北岸建立一所男童寄宿学校, 即之江大学的前身“崇信义塾”。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 崇信义塾开办之初以“以培植教牧人才为宗旨, 裨可救人之灵, 顾人之身, 异日或可为国家之柱石”为办学目的。因此在课程设置上, 以宗教教育为主体, 兼及经学、作文、书法、算术、地理、天文、音乐等科目。^{[3]4}

1858 年 6 月,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条约第二十九款赋予了传教士自由传教的权利, 并规定“耶稣基督圣教, 原为劝人行善。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 当一体矜恤保护。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 他人毋得骚扰。”^[4] 有了条约的庇护, 传教士加速了在中国各地开办教会学校的步伐。杭州因便利的交通、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有比宁波多三倍的人口数量而受到传教士的关注。1867 年差会^② 决定在杭州布开设布道站, 崇信义塾迁入杭州, 改名育英义塾, 英文名为 Hangchow Presbyterian Boy's School,^[5] 取“乐育英才”之义。太平天国运动后, 杭州文化事业一派萧瑟, 所谓“人烟寥落, 无设学者”。迁校之初的育英义塾发展并不乐观。直到 1880 年, 传教士裘德生 (Junius H Judson) 主持校务并对课程进行改革, “期以泰西之文明灌输中国”, “益注意科学而添置理化诸仪器, 裨知实验”^[6]。学校设置中国经书、圣经见证、哲学、教义回答、

收稿日期: 2011-07-10

通讯作者简介: 刘剑虹 (1959-), 男, 浙江临安人, 院长/研究员/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管理、民办教育等。E-mail: liujianhong@nbu.edu.cn

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作文、辩论等课程,工艺课等手工操作课也在短时间内开设过。这是那一时期一所高中所要求的完整课程,在裘德生等人的改革下育英义塾的课程开始趋于现代化。

1893年,华中差会建议:“育英义塾是我们差会最先进的学校,应首先考虑发展成为高等学校”。^{[3]14-15}在连续开办两个超过高中水平的男子班后,育英义塾开始设置学院课程。这是对中国现代教育需求增长的回应,更是对国人“师夷”“自强”的刺激。1897年,学校改名为“育英书院”,英文名为 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学制6年,分正科和预科。正科为大学程度,增设英文、化学2科,并将其作为一门课来讲授;课程涉及圣经、救世教义、有机化学、无机化学、通史、英语、代数、生理、物理、动物学、政治经济学、音乐、体育、绘画等。预科相当于中学,学制4年。1902年,正科学制改为5年,预科改为附属中学,正科设圣经、中国经书、算术、代数、几何、史地、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生理、物理、英语、通史、经济等课,尤重英语,课程多用英语教科书。^{[3]17-20}与此同时,裘德生还从美国引进了各种先进的科学实验设备。现代化的课程设置和先进的教学试验设备,使育英书院成为19世纪中国较好的5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启蒙思想,对西学需求也迅速猛增,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新的征程。处于改革的浪潮之巅的育英义塾也必须对这场改革做出回应。是年秋,裘德生休假完便从美国带回来X光机的全部装备,无线电报、引擎、气压计、显微镜等实验设备,周懋功、马尔济等陆续来校任教。^{[3]20}作为当时拥有两千两百万人口的浙江省,育英书院是唯一高等教育机构,杭州城中的老校园已经无法满足生源剧增、学校发展的需要。1906年,掌校的裘德生(Junius H Judson)和王令赓(E L Mattox)等校董事会成员趁南北长老会协商合作办学之机,提出了扩大学校规模的提议,并获北长老会董事会认可。1907年,学校在钱塘江畔六和塔附近的二龙头筹建新校园。1908年,书院改正科、预科学制分别为四年。到1910年书

院的正科课程增至14门:圣道、经训、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理化、心理、法制理财、图画、音乐、体操等。^{[9]53}虽然课程门类大量增加,分类也逐渐趋于细致化,但按科系划分的现代大学课程设置并没有完全形成,宗教课程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学校的课程仍以基督教义为主,查经班、礼拜等也成为学生在校参加的主要活动。

另外,由于中国早期的教会高等教育大都由教会小学或者中学教育发展而来。不论从其办学形态还是课程设置,亦或是师资和学生素质及社会背景来看,都存在着前后衔接的关系,在难度和跨度上都需要相当长的调试过程。这些都成为了“育英书院”在办学过程中要实现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开设完备大学课程的桎梏。正如杰西·格·鲁茨所说:“19和20世纪建立起的那些自称为大学的教会学校,许多并未正式开设大学课程的学校,最后或解散或改设初级学院”^{[2]30},命运多舛。

(二) 扩充时期的课程设置(1911—1929)

为吸引更多的生源和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1911年2月,育英书院迁入钱塘江六和塔附近的二龙头新址,改名之江学堂。王令赓牧师(Rev, E L Mattox)出任校长,在校学生117人,中外籍教职员12人,^{[3]25}学校设大学部和中学部。1911年,在突然爆发的瘟疫与武昌起义的影响下,之江学堂仍然弦歌不断。1912年,学校开始改进课程。历史、地理、逻辑和政治经济学用英语教学,天文学、圣经、生物、化学、经学、地质学、物理学、心理学和三角学用中文教学。经两家差会和大学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1914年学校更名为杭州基督教学院(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中文为之江大学,至此成为一所名正言顺的高等教育机构。1917-1918学年,实行5年制课程(初级2年,高级3年),另设预科2年,新的课程开始引入,绘画、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高等物理等课程教学逐渐步入正轨。^{[3]40-41}1920年11月,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立案,正式拥有授予学位的资格和美国政府的合法承认。大学分文理两科,设有天文、生物、化学、数学、国文、英文、现代欧洲语、哲学、宗教、社会学等课程。^{[3]43}1922

年2月,校董会通过争取其能够成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决议,并认为学校的课时只能增加不能减少。除9门国文课、7门生物学课、4门化学课、5门教育学课、13门英文课程、2门地理课程,8门数学课程,7门物理课程,5门其他西语课程(2门法语、2门德语、1门希腊语)学,2门西方哲学课外,^{[3]45}学校还将宗教课被列为必修课,全体学生(其中很多是非基督徒)逢星期日上午必须做礼拜。^{[3]49}此外,之江大学健全了教授会,倡议并组织了校友会,同时积极发动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并于1923年起采用课外活动学分制,以参加课外活动的表现和时间为依据,考核后计入学分总量中。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国人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高涨,促发了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这引起了巴顿调查团^⑤的重视,他们认为教会学校虽不得不采纳官办学校的课程与标准,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但也应把教会学校办成一种不同于中国学校的健康的学校,在宗教气氛中进行教学而不受任何政治压力。^{[2]219}这只是代表差会利益的说辞,教会学校在中国注册的问题仍然迫在眉睫。1924至1927年间,关于“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须遵照中国的教学方针设置,不得将宗教科目列入必修课;取消关于宗教仪式的活动”,^[7]敦促各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向政府立案的法令不断颁布。但立案条例中有关宗教课程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教会利益,面对中国快速变幻的政治局势,一些传教士不得不承认教会学校只有向中国政府立案取得法律上的资格,才能保证学校的继续存在。

早在1917年,之江大学校董会就郑重提出立案问题,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向中国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可能性。^{[3]57}校友们在这次董事会上陈述了向政府立案的理由:“如果学校不立案,政府不会承认它是一流学校,这将不利于学生出国留学或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未立案学校的毕业生没有选举权,学校将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政府批准立案有利于学校从公立中学吸引一些优秀学生;与此同时,立案后学校必然要采用一种能平衡学术与工作标准的课程,这将不会废除或削弱宗教教育,也不会要求灌输儒教或其他非基督教教义。”^{[3]57}翌年,董事会在年会上

同意该校“在其目前章程和政策基础上”向政府申请立案,并建议采取措施在美国获得“能颁发学位,并且无论从哪方面都与在中国政府立案不发生冲突”^{[3]58}的特许状。但政府对宗教教育的看法与校董会、华中差会意见相左,再加上此时北伐战事导致社会动荡,学校财政问题突出,教务活动受到影响,校董会于1928年6月决议:私立之江大学于1928年秋季学期起暂行停办。

1929年秋季,在校友的强大压力下,大学复学。是年12月,董事会同意其发展成为高级学院并向政府立案。经校董会与国民政府协商后,学院确立了新的办学宗旨,并遵192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8]中关于大学教育机关设置的规定,即“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具备三学院以上才者可以称为大学;且三学院必须有理学院或农、工、医学院之一,不满三学院者为独立学院”,制定新的学校组织大纲,设文理两院并改名为“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男女合校,开始实行主辅修系制的专业教育^{[9]55},宗教课改为哲学课,另增设党义和军训课。文学院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6系;理学院设化学、生物、物理、土木工程4系。^[10]其中文学院经济系由当时的校长李培恩主持,并且吸纳了胡继媛、唐永庆等一批归国留学生,课程主要偏重于工商管理;土木工程系开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建筑工程等课程。之江文理学院这种不局限于传统的文、理学院科系课程设置,使得本属于商学院的经济学和工学院的土木工程学成为学校的特色专业。

二、立案前之江大学的课程设置特点

立案前之江大学课程设置虽尚未达到现代大学课程的标准,但不论是在课程目标的设立、课程内容与类型的选择,还是在课程实施与评价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一)课程目标:以培植教牧人才服务社会为宗旨

办学宗旨是学校课程目标设置的指导思想,课程目标的设置必须围绕办学宗旨进行。立案前之江大学的办学宗旨从最初的“以培植教牧人才为宗旨,裨可救人之灵,顾人之身”到1929年申请立案时表述的“经办之江大学的目的是执行

国民政府总的教育目标;以爱、牺牲、服务的基督徒精神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3]67}都表达了学校的宗教教育目的,且后者开始关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立案前该校所当行的教育功能并不是“生而有之”的,它的产生缘于基督教在华借学布道需要,课程围绕“在课堂中布道、在救济贫弱的社会服务中传教”展开,具有强烈的社会服务精神和浓郁的宗教氛围。

(二)课程类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按教育目的安排的各种课程和教学活动称为显性课程,诸如师生关系、校园文化、同侪团体、甚至环境等能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作用的则被称为隐性课程。^[11]立案前的之江大学作为差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必须按照办学宗旨开设各种有利于传播教义的课程,从显性知识传输的角度培养更多的教牧人才;在充分发挥教会大学的本职的同时,通过构建融洽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学生团体及优美的校园环境等,成为影响其早期人才培养的隐性因素。显隐并重的课程结构类型,使之江大学既保持了教会大学的文化底蕴,又在体现课程知识传输的灵活性的同时促成了学生文化心理内容的改变。

(三)课程内容:中西交互,重视体质亦重视心智

1. 重视英文与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

相对于认为“英语教育固然有助于培养高级教牧,但亦产生离间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的作用”^[12]的人来说,之江大学管理者在其开办之初就非常重视实际有效的语言训练。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开设英文课程、编写英文教科书;与此同时,在深谙“中国古学,精深博大,允非东西各国所能望其项背”^[13]的道理后,之江大学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以中文为教学语言。中西语言文化的学习,为其毕业生远赴海外求学及培养浙江近代翻译人才、对外商贸人才提供便利。

2. 重视体育、音乐与课外活动,德智体全面发展

近代中国动荡不安,多数国人无暇顾及强身健体、陶冶情操,而教会大学开设的体育与音乐课程却刚刚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之江大学自兴建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运动。为使学生能有更好的锻炼场所,该校修建了体育馆、游泳池,并聘请

外籍教师讲授音乐和体育。利用靠近钱塘江的地理优势,学校还建立了全国唯一一个专供学生划船训练的船坞。^[14]另有合唱团、唱诗班及各种乐器演奏团体。^[15]体育与音乐拉近了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之间心理距离,培养了学生的热爱生活、持久坚韧和团队合作精神。

3. 课程逐渐世俗化、专业化

早在1896年,传教士安保罗就建议“凡志在科名考,领中西并务,不可偏废。一切格致之要,俱当分门研究,精益求精。”^[16]这也成为大多数教会大学课程演进的映照。20世纪20年代前,之江大学施行没有专业性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宗教课程比重较大;20年代后,应时代所需,该校课程设置开始按照科系进行划分,范围扩大且难度提高。在减少宗教课程的同时引入现代大学课程,特别是经济学、建筑工程、机械工程、民用工程和教育学科课程的开设,为此后学校在中国注册立案奠定基础,也为近代浙江工业、教育发展培养了所需之才。

(四)课程实施:教学做合一,学以致用

传教士在中国办学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其本国教育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的课程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因此,早期的之江大学课程设置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倡导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此,学校购置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建造了浙江最早的天文观察台,使学生和现代科学得到了真切接触。通过教师的带领和指导,学生在校内的小型机械车间和铸造工厂里制作了教学所需的大部分物理教学仪器。实验课程的开设丰富了学生的研究视野,使其在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自我价值在理论与实践不断得到提升。

(五)课程评价:实行学分制的同时采用积点制,学位授予考核严格

之江大学以“学分·绩点制”来考核学生完成学业情况。学期成绩以平日成绩、月考成绩和期考试成绩各三分之一组成,设计及实验课程专注学生平日之成绩;“绩点制”规定各科成绩以70分为界给与绩点,60分以下者不赋学分并倒扣绩点。^[17]学年终了,除应获得或超过规定的学分总数外,还须获得超过规定的绩点数,^[18]

超过部分由课外活动所得学分补充。只有完成预定学习课程的学生可获得文凭,完成全部大学课程的毕业生可获得适当的学位。^[3]⁴³严格的现代学分、绩点、学位考核制度使得之江大学学术氛围甚浓,学生求知欲甚强,为其后期课程建设和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三、余论

通过对立案前之江大学课程设置的史料钩沉,不难发现,其率先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课程理念引入近代浙江高等教育,揭开了浙江近代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序幕。因此,不论是作为承担宣教功能的纯粹教会大学还是单纯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对近代浙江人才培养和高等学校课程现代化进程都有一定的推力,为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注释:

① 基督教派别之一,隶属加尔文宗(Calvinists),实行长老制,由信徒推选长老与牧师共同管理教会。南北战争后,形成南长老会、北长老会和北美联合会长老会。

② 差会(Foreign Missions),“差”音Chai,取神差遣人去传递福音之意。主要指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宣教的组织。

③ 该调查团由西方教育家、神学家、中国基督徒和传教士组成,于1921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巴敦的带领下对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进行调查。

参考文献

[1] 谭双泉.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

社, 1995: 47.

[2] 杰西·格·鲁茨. 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M]. 曾钜生,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3] 队克勋. 之江大学[M]. 刘家峰,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4] 汪毅, 张承荣. 咸丰条约第四卷[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31.

[5] 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 1840-1949[Z].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62.

[6] 杨聪玲. 之江大学办学形态研究——以抗战时期为中心[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9: 7.

[7] 霍益萍.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90.

[8] 朱家骅. 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2.

[9] 长利. 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J]. 教育评论, 1993(1): 28-32.

[10] 张文昌. 之江大学[M]// 浙江文史资料选集第29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126.

[11] 潘懋元. 高等教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128.

[12] 徐以骅. 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47.

[13] 李佳白. 论新旧教育之兼济[M]//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79: 533-544.

[14] 张鹏程. 之大往事[G].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27.

[15] 方威廉.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 1880-1950[M]. 刘家峰, 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5: 128.

[16] 安保罗. 崇实学[M]// 李楚材.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79: 408.

[17] 佚名. 之江大学档案[U]. 浙江省档案馆. L52. 1. 9-2.

[18] 高时良. 中国教会教育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151.

The Curriculum Provision and Features of 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 before its Registration

REN Hang-lu, LIU Jian-hong

(College of Teachers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112, China)

Abstract: Of the 13 representative Christian universities found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 is the only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at was jointly set up in Zhejiang by P. C. U. S and P. C. U. S. A. Its unique curriculum provision has paved a solid foundation to Zhejiang's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its cultivation of ideologically new talents.

Key words: registration; Hangchow Christian University; curriculum provision; features

(责任编辑 周密)